

#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

马忠东 王建平

**【摘要】**文章探讨了家庭决策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降低流入者的现存失业率进而拉低城镇总体失业率。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对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就失业概率而言,农村流入人口远低于城镇居民;镇居民低于市居民;女性高于男性;年轻组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体最低,但高校新近毕业生却较高。另外,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其失业模式。失业水平在东北、武汉、重庆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在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和总体居中的“高低中”模式,仅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平衡发展的华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低、农民工低和总体低的“三低”模式。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城镇失业 区域差异

**【作者】**马忠东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王建平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

##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和城乡的就业格局。在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同时,城镇居民中却出现了青年待业、中年下岗的现象。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持续增长的就业压力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与之相矛盾的是,中国城镇总体失业率一直处于相对低的水平,而且近年来甚至有所下降。失业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国内很多学者研究过失业率问题,但受到定义和数据统计的影响,许多学者只能估计或推算失业率,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大。例如,龚刚敏(2005)在讨论不同口径失业率时指出,一些学者(胡鞍钢、陈淮、李伯勇)和研究机构(国情小组、香港渣打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1995~2000年城镇失业率的估计值介于4.0%~9.37%之间;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末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左右;杨启先估算出2001年的中国城镇失业率大约为10%左右;周天勇则利用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实际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比较,认为2002年城镇真实失业率为12.4%。另外,李实、邓曲恒(2004)基于2002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估计出不同定义类型的失业率在8.6%~

12.4%之间。Giles 等(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1 年《中国城镇劳动力调查》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出中国城镇户籍居民失业率由 1996 年 1 月的 6.1%上升到 2002 年 9 月的 11.1%,而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城镇居民的失业率则由 1996 年的 4.0%上升到 2002 年的 7.3%。Han 等(2010)利用国家统计局 1988~2006 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估算中国城镇失业率,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到 2003 年,女性失业率达 13.7%,远高于男性(8%)。胡英(2009)通过建立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估计模型,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调查数据,估算出全国城镇失业率由 2000 年的 8.3%降至 2008 年 2.9%~5.8%,其中市的失业率由 2000 年 9.4%降至 2008 年的 3.8%~6.9%,镇由 2000 年的 6.6%降至 1.7%~4.2%。在全球经济危机严峻的 2009 年,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也仅为 4.2%。

较低水平的城镇失业率统计值与持续增长的就业压力现状不符,也一直让政府劳动部门、研究机构和有关学者困惑不解。那么,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现状到底怎样?不同户籍性质、不同人口特征和不同地域的人口失业率有何差异?影响中国城镇失业率因素有哪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率有何影响?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重点讨论劳动力流动对失业率产生的影响。

## 二、理论视角及研究假设

影响中国城镇失业率的因素很多,但对劳动力供给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这一现状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和城乡的就业格局。研究中国的失业与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率的影响不可回避。

### (一) 劳动力迁移与失业关系的理论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镇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刘易斯在其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中,假设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或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工业扩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工作机会,造成传统部门(农村)向现代部门(城市)的转移。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隐含假设为劳动力迁移后的全就业或极低水平的失业率。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托达罗在其城乡二元迁移模型中,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好,制造业工资制度化定在均衡水平之上,远高于农村平均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动力在于城镇预期收入,也就是城市制造业工资与就业率的乘积。即便失业率高,不可能马上就业,只要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平均收入则持续迁移,进入城市等待、寻找工作机会。此模型解释了非洲、拉美城市中出现的高失业率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存的现象。托达罗模型中,如果一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大,城镇预期收入就会高,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会过量,失业率就会有增无减。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二元模型的基础上,将城镇劳动力市场细化为受教育水平高、收入高、职业正规的主要部门与为主要部门人员服务的低工资、受教育水平低、非正规职业的次要部门。次要部门对廉价的低层次劳动力有大量需求,外来劳动力会填补本地劳动力供

给的不足。与其他理论不同,此理论强调发达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内在需求。主要部门就业有限,收入高,但“门槛”高,要求高,职位少,而次要部门的就业“门槛”低。由于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要求低,能够接受在低工资、高强度的次要部门工作(姚先国、俞玲,2006),因此其失业率反而低于城镇居民,形成“弱者的优势”(张展新,2006)。丁仁船、吴瑞君(2006)也发现,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高度互补、小幅替代,并且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间的替代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除此之外,移民网络是打工者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起着降低迁移成本和减少风险的作用。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迁移者可以依靠迁移网络传递信息减少失业。

以斯塔克(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则认为,家庭户才是分析的有效单位,迁移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入最大化而是收入多样化。在资本和保险市场不健全的前提下,斯塔克风险回避论以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迁移的策划单位,其目的不完全在于工资收入,更主要的是为了分散风险。

## (二) 城乡双二元格局及研究假设

与以往假设的城乡二元模式不同,中国目前的就业现状可描述为户籍控制下的城乡双二元格局。旧户籍政策下,城乡居民只能在户籍地(乡镇或县单位)工作。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允许农民工进城在非正式部门打工或从事非正式职业的工作,但却严格控制无户籍的流动人口进入正规部门,并强化了城镇里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式。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加,使农村也产生了农业、非农就业分化趋势。总体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双二元的格局:城镇的保障部门(P)与无保障部门(NP),农村的农业部门(A)与非农部门(NA)。就平均收入而言,保障部门收入由国家部门及企业决定,高于其他三部门,农业部门收入最低,非保障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差异相对较小。针对中国的双二元格局,本文就劳动力流动对失业的影响做以下假设。

1. 居民预期收入假设。由于户籍控制,保障部门不对流动人口开放,就业受到保护,不具有灵活性。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设适用于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城镇户籍居民,这类人群往往不太愿意进入无保障部门。高工资、高福利使保障部门新增岗位有限,因此许多新增劳动力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就业,城镇居民失业率( $u_0$ )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制度下,教育对就业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使受过高等教育者具有进入正式部门的优先权,取得的职位不仅稳定,还有上升空间。因此,高等教育对正式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保留效应。总体来说,失业概率在中等教育以上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会被保障部门拒之门外,在无保障部门的就业,预期收入不高,反而其失业概率比中等教育程度的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增加提高了择业标准,毕业后就业难度增加,待业寻找以最终在保障部门谋得职位,因此高等教育对就业又有较强的选择效应,从而大大增加毕业后的失业概率。

2. 劳动力回流减压机制。由于户籍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入保障部门的概率极低,因此其预期收入并不高。在工业急剧扩展时,刘易斯的全就业假设适用于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居民。是否进城打工,由无保障部门的平均收入与农业平均收入差决定。双二元格局下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从农业部门到城镇无保障部门,部分回流到农村非农或农业部门。工业严重不景气时,劳动力回流就成为城镇失业的减压器。失业者的增加会促使回流增加,等量减少了失业数(分子)和城镇的总流动人口数(分母),降低了现存失业率。假设年初流动农民工总数为  $M$ ,无回流状况下农民工失业数为  $U$ ,失业率为  $\bar{u}_1$ ,年失业回流数为  $R$ ,失业回流率为  $r$ ,则年末城镇农民工现存失业率( $u_1$ )可表达为: $u_1 = (U - R) / (M - R) = (M \times \bar{u}_1 - M \times r) / (M - M \times r) = (\bar{u}_1 - r) / (1 - r)$ 。失业回流率小于 10% 时,农民工现存失业率可简化用失业率与回流率的差值来近似: $u_1 \approx \bar{u}_1 - r$ 。也就是说,其流动随经济周期自我调节,经济繁荣时大量流入城市,不景气时回流乡村。劳动力流动迁移网络的这种社会资本加强了农村与非正式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强化了流动调节机制。

基于回流减压机制及平衡机制,我们预期失业水平在不同人群中差异较大,农村流入者的现存失业水平会在相当程度上低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

3. 平衡机制。较低的农民工现存失业率会平衡总城镇失业率( $u$ )。假定进城农民工占城镇总劳动力的比例为  $m$ ,则: $u = u_0 \times (1 - m) + u_1 \times m$ ,也就是说,城镇失业率是农民工现存失业率与本地居民失业率的加权平均值。农民工现存失业率越低,农民工比例越高,则对城镇高失业的平衡作用越大。工业扩展初期,当保障部门比重大时,无保障部门职位有限,失业率偏高,我们会从预期收入假设预计城镇失业模式为本地居民高,农民工偏高,总体高。相反,在无保障部门急剧扩张,保障与无保障部门比重相当的情况下,农民工现存的低失业率会平衡城镇居民的高失业率,城镇总失业率会被低估。在城乡劳动力都过剩的情况下,城镇失业概率应随劳动力在非正式部门的比例上升而下降。中国现阶段,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出现区域劳动力不足引发劳动力竞争(马忠东、王建平,2010)。企业可按其性质划分为: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属于有保障的正式部门。在非保障部门,私营企业面向居民和农民工就业,而“三资”企业雇工主要是外来农民工。

基于城镇失业的平衡机制,在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依照区域发展模式划分失业模式,对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失业水平提出以下假设:(1)国有企业主导型区域会呈现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符合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设。(2)“三资”企业主导型区域农民工就业机会多,但不能改变本地居民就业难的状况,平衡之下会产生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总体中等的“高低中”模式;(3)均衡发展型区域,国有、私营和“三资”发展并重,大量私营企业同时吸收城镇居民及外来人口就业,产生理想状态的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低的“三低”模式。



三、数据与统计分析模型

本文采用的主要数据为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包括现居住地,家庭(结构、规模和住房)、个人基本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户籍地、迁移流动原因、生育及劳动力就业信息(劳动力参与、职业、收入等)。根据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问卷中设计的问题,就业的定义为在调查时点过去 1 周内工作超过 1 个小时或者处于在职休假、学习、临时停工或季节性歇业未工作;失业可定义为过去 1 周内未做任何工作、3 个月内找过工作且如果有工作机会能在两周内开始工作。本文重点研究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处于失业或就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活动人口,既不是失业也不是就业状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为失业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比。根据数据信息,首先将人口按城镇、人群、区域划分来分析失业水平的差异。将人群依照居住地类型(市、镇)、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进行划分。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将新近高校毕业生与老毕业生分开。在城镇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上,将人口按户籍分为本地居民、城镇外来人口和农村外来人口三类群体。众多研究涉及本地居民和来自农村外来人口,而来自城镇的外来人口没有作为单独的群体加以研究。本文中的本地居民是指调查时点没有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人口,城镇外来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且其户籍性质为城镇户籍的人口,而农村外来人口则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包括半年以下的短期和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动)且户籍性质为农业。这样界定农村外来人口是由于其流动性高,为防止漏掉大批的短期流动人员而不采用半年以上这一时间限制。

表 1 2005 年分户籍、区域的不同类型企业  
从业人员比重与社会保险覆盖率 %

	从业人员比重			社会保险覆盖率		
	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	私营 企业	“三资” 企业	失业 保险	基本养老 保险	基本医疗 保险
全国城镇	20.2	18.2	20.4	22.0	34.7	42.1
京、津、沪	23.2	13.1	31.6	48.2	55.7	59.5
传统重工业区	36.4	15.0	9.6	20.1	35.8	35.4
华北三省	32.6	14.5	5.2	24.1	37.6	39.8
西南地区	32.0	18.0	3.6	17.9	28.8	38.5
西北地区	44.9	7.7	2.7	23.9	32.7	40.0
华东沿海地区	9.1	25.0	22.9	20.8	35.7	50.9
珠江三角洲地区	5.2	13.7	53.2	21.0	33.5	42.4
中南地区	28.5	16.5	5.5	18.4	29.2	35.5
本地人口				23.5	37.2	47.3
城镇外来人口				41.0	58.3	56.7
农村外来人口				5.9	12.0	15.8

资料来源: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一) 区域划分

由于区域划分比较复杂,本文依据从业人员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比重及体现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将全国划分为传统工业基地(东北三省、湖北和重庆)、华北三省份、西北、西南、京、津、沪 3 个直辖市、珠三角、华东沿海 4 个发达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中南部省份(湖北、珠三角除外)。从表 1 可以看到,

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明显高于失业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城镇 16~59 岁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大约为 42.1%,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为 34.7%,而失业保险覆盖率最低,为 22%。京、津、沪地区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其失业保险的覆盖率最高,超过 48%,远高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 22%。其他地区城镇人口的失业保险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大约在 18%~25%之间。京、津、沪地区城镇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均处于全国的前列,分别为 55.7%和 59.5%。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三资”企业为主,其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率都不是很突出,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基本上与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水平持平或者略低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华东沿海 4 个发达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私营和“三资”企业为主,城镇人口失业保险覆盖率略低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略高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则远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水平,达到 50.9%。

## （二）统计模型

为了深入研究影响失业的因素,下面利用 Logit 模型对中国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假设某一城镇劳动力具有以下特征:个人特征  $s$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民族、健康状况、家庭规模);户籍类型  $h$ ;区域  $j$ ,则个体的失业行为:

$$P(s, h, j) = \frac{\exp[C + A'X(s, h, j)]}{\sum \exp[C + A'X(s, h, j)]}$$

其中,  $P(s, h, j)$  是该个体在研究年份的失业概率;  $C$  为未知参数;  $A'$  为  $k$  个未知参数的行向量;  $X(s, h, j)$  为  $k$  个解释变量的列向量。这里可以通过极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参数。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可通过其显著性水平直接反映,而模型的拟合优度则可以通过 Rho-square(1- 给定模型的对数极大似然值与零模型对数极大似然值之比)来测度。Rho-square 倾向于较小取值,当比数比等于 0.2 时表明模型拟合很好。比数比(Odds-ratio)为模型估计系数的指数转换,以参照组为 1,如果比数比大于 1 表示该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效应,小于 1 表示该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负效应。

## 四、城镇失业模式

根据 2005 年 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 年全国 16~59 岁组人口城镇总失业率为 5.6%,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其中市、镇失业率分别为 6.5%和 4.0%(见表 2)。如果从性别来看,16~59 岁组男性城镇失业率为 4.9%,女性高于男性,为 6.7%。如果从人口来源考察,本地居民的失业率为 6.3%,城镇外来人口失业率略低,为 6.1%,而农村外来人口仅为 3.1%,远低于本地居民和来自城镇的外来人口。按照人群和区域划分,可以将失业率进一步归纳为年龄模式和区域模式。

### （一）年龄模式

从表 2 可以看出,城镇 16~17 岁组的失业率最高,之后的高年龄组失业率呈逐渐下降趋势;镇的失业率在 18~22 岁和 23~24 岁组下降较快其后缓慢下降;市的失业率变化有波

表 2 2005 年城镇分人群、区域的失业率 %

	城镇	市	镇	男性	女性	本地居民	城镇流入人口	农村流入人口
合计	5.6	6.5	4.0	4.9	6.7	6.3	6.1	3.1
年龄组(岁)								
16~17	11.9	10.9	13.4	15.1	9.0	20.2	11.8	4.3
18~22	10.0	10.2	9.6	11.3	8.8	16.7	10.8	3.0
23~24	8.4	9.2	6.6	8.0	8.9	11.2	7.5	3.6
25~29	5.8	6.5	4.5	4.6	7.3	6.8	5.5	3.5
30~34	5.0	5.6	3.9	3.7	6.8	5.6	5.0	3.2
35~39	4.7	5.7	3.0	3.5	6.3	5.1	5.3	2.8
40~44	5.0	6.2	2.7	4.0	6.2	5.2	6.1	2.6
45~49	4.8	6.0	2.5	4.2	5.8	4.8	6.1	2.7
50~54	3.4	4.5	1.7	3.6	3.0	3.3	5.2	2.9
55~59	2.8	3.7	1.5	3.0	2.2	2.6	4.9	2.2
地区								
京、津、沪	6.1	6.3	4.4	5.6	6.7	8.1	6.0	2.8
传统重工业区	9.7	10.9	6.8	7.7	12.5	10.1	10.3	6.7
华北三省	4.7	5.7	3.2	3.9	6.0	4.7	5.4	4.0
西南地区	5.3	6.1	4.4	4.8	6.0	5.6	5.3	3.6
西北地区	5.4	7.1	3.1	4.5	6.7	5.6	5.7	3.6
华东沿海地区	3.5	4.0	2.4	3.0	4.0	3.9	4.1	2.0
珠江三角洲地区	5.6	5.7	4.8	5.3	6.0	10.1	5.1	2.5
中南其他地区	5.5	6.5	4.3	4.9	6.3	6.0	5.7	3.2
受教育程度								
没有上过学	2.0	2.9	1.3	1.5	2.3	1.7	5.8	2.7
小学	3.1	3.8	2.4	2.6	3.6	3.1	7.5	2.9
初中	6.1	7.0	4.6	5.0	7.6	7.1	8.8	3.1
高中	7.9	8.8	5.7	6.9	9.4	9.0	7.2	3.2
大专	3.3	3.9	1.9	2.9	3.9	3.4	3.2	3.9
大学本科	1.8	2.0	0.8	1.7	1.9	1.7	1.8	2.9
研究生	0.9	1.0	0.6	0.8	1.4	0.8	1.2	0.0
高校应届毕业生	13.9	14.3	12.1	15.8	12.2	17.7	8.8	6.2

资料来源: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动,失业率最高的是年轻组中的 16~17 岁组,18~22 岁组次之,从 23~24 岁组开始下降,但 40~44 岁组和 45~49 岁组的失业率又上升至接近 25~29 岁组的水平。

分年龄组看,镇的失业率主要是年轻组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失业率开始下降,而市的失业率则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除低年龄组失业率很高外(16~17 岁为 10.9%,18~22 岁为 10.2%,23~24 岁为 9.2%),49 岁以前的其他年龄组的失业率也较高,在 5.5%以上。无论市还是镇均为青年人(16~24 岁)的失业率最高,这种规律与发达国家的状况是一致

的。其原因可能是青年人受教育程度高但缺少工作经验,在市场上竞争时处于暂时的劣势;也可能是青年人因为自身受教育程度高,找工作时容易眼高手低,一些人可能找一份临时性工作维持生计,一边工作一边寻求新的机会,而转换工作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失业。城市中的 40~50 岁人员仍处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失业率较高,这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不断发育,劳动年龄人口知识结构接受市场筛选的结果;另外,这一年龄段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失业下岗人员,按年龄推算,失业下岗人员中 40~50 岁人员,经过 5~10 年的时间,其中一部分人步入退休年龄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放弃,退出劳动力市场。

分性别来看,男性失业率在年轻组非常高,16~17 岁和 18~22 岁组失业率超过 11%,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失业率急剧下降。25~29 岁组下降到 5% 以下,然后再缓慢下降,35~39 岁组下降到 3.5%,但 40~44 岁和 45~49 岁组的失业率有所回升。女性失业率在 16~17 岁组最高,为 9% 左右,其后年龄组失业率呈逐渐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远小于男性,50 岁以前女性失业率都在 5.8% 左右。

图 1 可以看出,本地居民与农村外来人口的失业年龄模式差异很大。本地居民的失业率年轻组为 10% 以上,16~17 岁组高达 20% 以上,但随着年龄增长失业率逐渐下降,25~29 岁组下降到 7% 以下,45~49 岁组下降到 5% 以下。而城镇外来人口,其失业率随年龄变化也呈下降趋势,但年轻组失业率远低于当地居民,40~44 岁和 45~49 岁组的失业率有所回升。农村外来人口的现存失业率尽管随年龄变化也呈下降趋势,但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失业率最高的 16~17 岁组,失业率也只在 4.3% 左右,其他年龄组大多在 2%~4% 之间波动。

(二) 区域模式

从表 2 可以看出区域失业模式差异很大。传统工业基地城镇失业率最高,达到 9.7%;其次是京、津、沪,失业率为 6.1%;再次是珠三角、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失业率大约在 5.3%~5.6% 之间,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城镇失业率大约为 4.7%,而华东沿海发达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的失业率最低,为 3.5%。

分市、镇和分性别的失业率在地区上的差异不大,但从人口来源看,不同地区的差别很大。珠三角地区是最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尽管其整体的城镇失业率并不很高,但当地城镇居民的失业率达到 10.1%,而农村外来人口的失业率仅为 2.5%。京、津、沪是另一主要人口流入地,与珠三角地区情况类似,当地城镇居民失业率超过 8%,但其农村外来人口失业率为 2.8%。

图 2 给出了分省的城镇失业率。从中可以发现,失业率不但地区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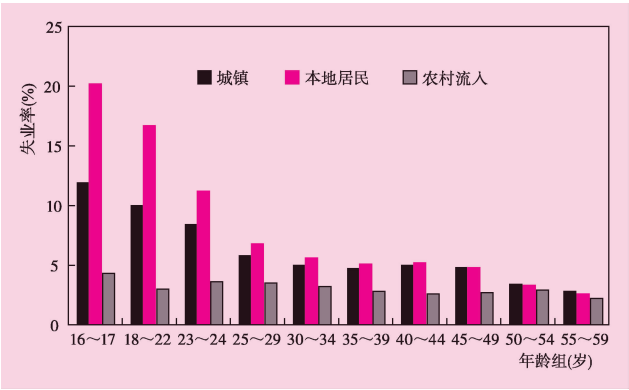


图 1 2005 年城镇分户籍性质的失业年龄模式



差异,同一地区之内最高与最低失业率相差较大,分省比分地区能够看出更多的问题。东北三省城镇失业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辽宁省的失业问题最为突出;城镇失业率均较高的省份还有湖北、重庆和海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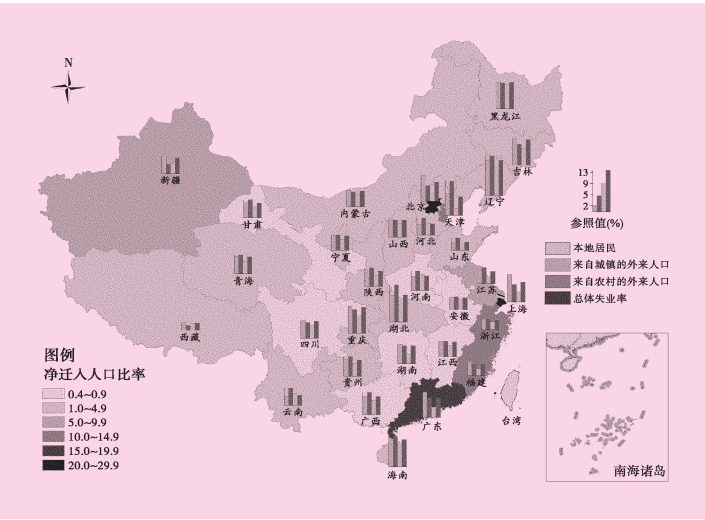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各省城镇分户籍性质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从图2合计的失业率看,城镇地区的本地居民与来自城镇的外来人口比较接近,而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则具有较低的失业率。这并不能说明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就业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于本地居民的劳动力市场,更多地接受收入报酬低、工作强度大的工作,且缺少社会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就无法在城市中维持生计。天津、河北、湖北、云南的城镇地区来自城镇的外来人口失业率与本地

居民的失业率相差较大,都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除河北、山东、河南和云南外,其他省份的本地居民失业率均高于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的失业率,而这几个省份失业率相差也都低于1个百分点。

(三) 教育模式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城镇人口失业率的差异。从整体上说,失业率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基本上呈抛物线。没有上过学的人口失业率较低,仅为2.0%,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失业率呈现增长趋势,在高中达到顶点,为7.9%,然后急剧依次下降到大专(3.3%)、大学本科(1.8%)和研究生(低于1%)。但刚毕业的高校学生的失业率较高,将近14%,远超过整体失业率(5.6%)。分市镇、性别和来源地的失业率在不同教育程度上的分布模式基本类似。

五、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影响失业因素的重要性和影响大小,下面利用Logit模型将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全模型),并将城镇失业分城镇、性别、户籍性质进行回归(分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一) 城镇总模型

将城镇居民分为市居民(参照组)和镇居民,并进一步将城镇人口按户籍性质分为本地

表 3 影响城镇失业因素的 Logit 模型回归概率比(2005)

变 量	城镇	市	镇	男性	女性	本地居民	城镇流入 人口	农村流入 人口
区域(中南部)*								
传统重工业区	1.731***	1.754***	1.768***	1.507***	1.973***	1.672***	1.767***	2.184***
华北三省	0.838***	0.883***	0.772***	0.793***	0.907***	0.769***	0.923*	1.381***
西北地区	1.024	1.157***	0.802***	0.962	1.093***	1.005	1.093	1.196***
西南地区	1.048***	1.003	1.150***	1.077***	1.013	1.056***	0.969	1.151***
京、津、沪	1.116***	1.141***	1.176***	1.180***	1.032	1.212***	1.093**	0.867***
珠江三角洲地区	0.987	1.041*	1.085***	1.143***	0.863***	1.506***	0.741***	0.776***
华东沿海地区	0.628***	0.652***	0.622***	0.639***	0.616***	0.629***	0.665***	0.634***
年龄组(40~44岁)								
16~17	2.112***	1.661***	3.988***	2.517***	1.734***	2.503***	1.033	2.410***
18~22	1.567***	1.382***	2.310***	1.520***	1.516***	1.789***	1.054	1.601***
23~24	1.344***	1.245***	1.702***	1.091***	1.503***	1.354***	0.915*	1.678***
25~29	1.243***	1.161***	1.561***	0.957*	1.431***	1.211***	0.933*	1.480***
30~34	1.136***	1.051***	1.469***	0.970	1.241***	1.136***	0.857***	1.282***
35~39	1.033**	1.004	1.164***	0.937***	1.104***	1.035**	0.880***	1.135***
45~49	0.927***	0.914***	0.944***	0.958*	0.908***	0.927***	0.919*	1.017
50~54	0.750***	0.760***	0.735***	0.900***	0.554***	0.746***	0.784***	1.195**
55~59	0.689***	0.694***	0.741***	0.830***	0.472***	0.708***	0.793***	0.898
户籍(市居民)								
镇居民	0.585***			0.553***	0.618***	0.569***	0.592***	0.854***
城镇户籍流动者	0.825***	0.818***	0.867***	0.740***	0.936***			
农村户籍流动者	0.336***	0.307***	0.501***	0.218***	0.517***			
婚姻:单身(已婚)	1.781***	1.718***	2.126***	2.728***	1.150***	2.203***	1.608***	0.642***
丧偶(已婚)	1.025	1.032	1.015***	1.023	1.034	1.047	1.292*	0.814
离婚(已婚)	1.986***	1.878***	2.418***	2.651***	1.539***	2.151***	1.370***	1.590***
性别:女性(男性)	1.403***	1.374***	1.484***			1.322***	1.508***	2.445***
家庭:≥5人(<5人)	0.967***	0.953***	0.992***	1.020	0.967**	0.870***	1.323***	1.390***
民族:少数民族(汉族)	1.010	0.994	1.019***	1.035	0.979	0.997	1.051	1.101**
健康:自理(健康)	2.081***	2.208***	1.491***	2.064***	2.056***	1.987***	2.957***	2.339***
身体差(健康)	8.939***	7.435***	<0.001	9.459***	6.480***	9.451***	5.162***	1.859***
受教育程度(小学)								
没有上过学	0.692***	0.794***	0.674***	0.506***	0.768***	0.619***	0.713*	0.849**
初中	1.557***	1.563***	1.395***	1.567***	1.606***	1.779***	1.059	1.132***
高中	1.778***	1.703***	1.881***	1.936***	1.734***	2.121***	0.845***	1.279***
大专	0.700***	0.694***	0.657***	0.826***	0.637***	0.791***	0.369***	1.485***
大学	0.343***	0.340***	0.367***	0.422***	0.292***	0.364***	0.206***	1.223
研究生	0.183***	0.173***	0.401***	0.190***	0.196***	0.166***	0.132***	0.001
大专(21~23岁)	4.466***	4.513***	5.420***	4.111***	5.358***	4.759***	3.489***	2.949***
大学本科(21~23岁)	2.546***	2.549***	3.321***	2.546***	2.761***	2.513***	2.066***	1.516***
研究生(23~26岁)	2.380***	2.165**	5.202***	3.176***	1.862	3.523***	0.661	0.909
肄业辍学(已毕业)	0.907***	0.924***	0.885***	0.915***	0.874***	0.877***	1.255**	0.874**
Rho-square	0.080	0.070	0.080	0.110	0.060	0.100	0.070	0.050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P&lt;0.05,\*\*P&lt;0.01,\*\*\*P&lt;0.001。

居民(参照组)、城镇流入人口和农村流入人口。总模型中,镇居民的失业概率远小于市居民,仅为市居民的 0.585。农村流入劳动力失业概率仅为城镇居民的 1/3,此概率比在分模型中,男性低至 0.22,市只有 0.31,镇或女性的概率比稍高。以上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入分散了城镇的总体就业压力,证实了本文流动分压的假设。拥有城镇流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失业概率比为 0.83,男性为 0.74,女性为 0.94,说明城镇居民的流动,特别是男性的流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失业压力。在模型中,我们加入了区域变量包括传统工业基地、华北三省份、西北、西南、京、津、沪、珠三角、华东沿海 4 个发达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中南部省份(除湖北及珠三角外)作为参考组。城镇的失业概率以传统工业区最高,为参照组的 1.73 倍,华东沿海最低,仅为参照组的 63%。最高与最低的失业概率比高达 2.75 倍,说明失业的地区差异极大。有趣的是,除了两极之外,其余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模式迥异,但总失业概率差异并不大。与参照组相比,华北失业概率略低(0.84),京、津、沪略高(1.12),西北、西南、珠三角都与参照组非常接近。

## (二) 分户籍人群模型

本文分户口分模型将本地居民、城镇流入人口、农村流入人口的失业与相关因素进行回归。本文的流动分压平衡假设在两类主要流入地得到了证实。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两类主要流入地,共吸引了近一半的跨省流动者。分户籍模型结果显示,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本地居民失业概率分别为参照组的 1.21 倍和 1.51 倍。大量的农村流入人口的现存失业概率仅为城镇居民的 1/3,而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失业概率更低,分别为参照组的 87%和 78%。本地居民(高)和农民工(低)的平衡结果显示,在城镇总模型中,总体失业概率京、津、沪仅比参照组高 12%,珠三角与参照组、西北、西南并无明显差异。

以上结果表明,这两类主要流入地的模式属高本地居民失业率、低流动人口失业率及中等总失业率,充分证实了本文的流动减压平衡假设。作为与珠三角旗鼓相当的打工目的地,华东沿海地区吸引了 1/4 以上的跨省打工者。由于国企、民企、“三资”企业的均衡发展,华东沿海的失业概率不论城镇、性别,居民还是流入农民工,都属全国最低,总体失业概率为参照组的 63%,分失业概率也都在参照组的 62%~67%之间,为理想的失业“三低”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设仅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老工业区得到了证实。老工业区所有的失业概率都是最高的,本地居民、城镇流动人口与农村流入人口的失业概率比分别为参照组的 1.67、1.77 和 2.2 倍。分性别模型显示,老工业区男、女性失业概率分别为参照组的 1.5 和 2.0 倍,女性失业在老工业区尤为严重。国有企业主导和有制度保障的高工资降低了城镇创造就业的能力,农村劳动力流入也只能加剧失业,造成失业的“三高”。华北的就业模式也较特别,其居民失业概率仅高于华东沿海地区(为参照组的 77%),而华北农民工的失业率较高,高出参照组 38%。总的来说,华北城镇总失业概率偏低,为参照组的 84%。西南、西北与参照组失业概率比近似 1,说明总体差异很小。失业概率比在 1.15~1.20 之间的有西部城市、西南的镇、西北和西南的农村流入人口,失业概率比参照组略高 15%~20%,西部镇概率比为 0.80,比参照组低约 25%。

### （三）年龄因素

分年龄的失业概率在 60 岁前为单调下降的,分为年轻段的快速下降期,25 岁或 30 岁后的平缓下降期和 50 岁后因提早退休而形成的下降期。以 40~44 岁失业概率为 1,城镇整体失业概率由 16~17 岁的 2.11 快速下降到 18~22 岁的 1.57,再下降至 23~24 岁的 1.34,从 25 岁开始缓慢下降,由 25~29 岁的 1.24 下降到 45~49 岁的 0.93;再由 50~54 岁的 0.75 下降到 55~60 岁的 0.69。市的下降较缓,从 16~17 岁的 1.66 下降到 23~24 岁的 1.25,从 25 岁进入稳定期。相对而言,镇的下降幅度大,周期长,从 16~17 岁的 4.0 一直下降到 25~29 岁的 1.56,在 30~35 岁保持在 1.5,35 岁后才稳定在 1 左右。男性失业概率在年轻时超速下降,从 16~17 岁的 2.52 到 18~22 岁的 1.52,23~50 岁之间稳定在 1 左右,50 岁后下降但不太明显。女性失业概率下降平缓,16~17 岁为 1.73,18~29 岁稍微下降,保持在 1.5 上下,30 岁以后进入稳定期,50 岁后又因提前退休而急剧下降。除了年轻段(16~24 岁)下降幅度稍大以外,本地居民的年龄模式与城镇整体模式无异。城镇流动人口的失业概率随年龄的增加仅稍微下降,多数年龄因素并不显著。农村流动人口中,16~17 岁失业概率最高(2.41),18~24 岁维持在 1.6 上下,30 岁后进入相对稳定期。

### （四）民族、家庭、婚姻和健康因素

城镇人口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失业概率比约为 1.01,而其他各个模型中失业概率比在 0.99 和 1.05 之间,说明民族身份对于失业概率几乎没有影响。家庭规模和婚姻状况对失业的影响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家庭规模对于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无论是城镇流入还是农村流入人口,大家庭(5 人以上)人口,其失业概率约为一般家庭(5 人以下)中的人口的 1.3 倍左右。单身与结婚的失业概率比在市镇整体人口中为 1.78,在市人口中为 1.72,而在镇人口中则高达 2.13,说明结婚后失业概率迅速下降。单身与结婚的失业概率比在本地人口中为 2.20,在男性人口中为 2.73,说明当地未婚男性失业状况最严重。相对而言,农村流入人口中单身与结婚的失业概率比仅为 0.64,说明单身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在城镇人口中,离婚与结婚的概率比为 1.99,说明离婚的失业概率高。丧偶的概率比为 1.03,表明其与结婚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女性与已婚男性相比,概率比为 1.4,反映男女在生育孩子和照顾家庭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女性失业风险大。从分市、镇与分流入人口的来源的模型来看,其模式差别不大。失业也受健康程度的影响,在城镇人口中,身体差与身体健康的失业概率比为 8.9,远高于可自理与身体健康的概率比(2.1)。但在农村流入的外地人口中,失业概率比为 1.86,相对而言,可自理的失业概率比为 2.34。

### （五）教育因素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小学文化程度相比,城镇中没有上学过的概率比为 0.69,初中与高中分别为 1.56 和 1.78。市与镇的情况差不多,与小学文化程度相比,没有上过学、初中和高中的失业概率比在市人口中分别



为 0.79、1.56 和 1.70;在镇人口中分别为 0.67、1.40 和 1.88。在分性别的模型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人口的表现模式差不多,本地居民情况也类似,与小学文化程度相比,没有上过学、初中和高中的失业概率比在市人口中分别为 0.62、1.78 和 2.12。但在城镇流入和农村流入的人口中,与小学文化程度相比,没有上过学、初中和高中的失业概率比相对当地人口来说却要小得多,城镇流入人口分别为 0.71、1.06 和 0.85,农村流入人口分别为 0.85、1.13 和 1.28。说明城镇当地人对无保障部门的工作兴趣相对低,这类工作对于外地流入人口具有强烈的选择效应。由于“门槛”效应,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在大专及以上体现得更加重要。大专及以上失业概率基本上随教育程度增高而递减,与小学文化程度相比,从大专的 70%到大学本科的 34%,再到研究生的 18%左右。大专和大学本科在市人口与镇人口差异不大,在男、女人口模型中的模式也差不多。但研究生与小学文化程度的失业概率比为 0.40,远大于市人口(0.17),说明在镇,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对于就业的影响差别并不很大(镇人口在大学学历的失业概率比为 37%)。从人口来源地来看,本地人口大专及以上失业概率(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为 0.79、0.36 和 0.17)却相对高于外地城镇流入大专以上人口(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为 0.37、0.21 和 0.13)。

(六) 毕业效应

表 3 显示,21~23 岁的大专毕业生,21~23 岁的大学本科毕业生,23~36 岁毕业的研究生的失业概率比分别为 4.47、2.55 和 2.38,远高于其他教育组,反映出扩招后高校毕业生失业严重。这种情况在城镇本地居民中更加突出,新近毕业的大专生、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参照组的失业概率比分别为 4.76、2.51 和 3.52。正式部门工作收入高、福利好、工作稳定有保障,因此竞争压力大、条件要求高。刚毕业的高校学生中的本地居民,因为户籍优势,对当地正式部门的工作拥有优先权,再加上由于人力资本增加导致的择业标准的提高,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导致他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代价来等待,以最终谋取在正式部门的工作。相对而言,当地正式部门工作对于外地毕业生而言有着户籍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外地高校毕业生也不会花费时间来等待这种有保障的工作,因此失业概率相对低一些。在城镇流入人口中,与参照组相比,新近毕业的 21~23 岁大专生的失业概率比为 3.49;21~23 岁的大学为 2.07;23~26 岁的研究生为 0.66。肄业或辍学的失业概率大约为已毕业人口的 90%,这种情况在市、镇人口及其他模型中差别不大。

六、结 论

本文利用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失业的新假设进行了检验。发现流动者与城镇居民在年龄模式差异很大。城镇居民从年轻组高失业率急剧下降,25 岁后开始平缓下降,中年保持在低水平,而农村流入人口的现存失业率从年轻组到中年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回归结果发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现存)失业概率比仅为 1/3。较低的农民工现存失业水平会降低城镇总体失业水平,流动分压平衡假设在两个主要流入地得到了证实,京、津、沪

和珠三角地区共吸引了全国近一半的跨省流动者,但大量的农村流入人口的现存失业率远低于城镇本地居民,居民高失业水平和农民工低失业水平的平衡结果使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的总失业水平并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华东沿海地区吸引了 1/4 以上的跨省打工者,但由于国企、民企、“三资”企业的均衡发展,华东沿海的失业率为理想的“三低”型,并为全国最低。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老工业区,本地居民、城镇流入人口与农村流入人口的失业率均是最高的,为“三高”型。回归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城镇有保障的正式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保留效益和选择效应。

以上结果和发现对现行政策有以下启示:(1)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城镇和乡村发展都有其积极作用。(2) 地区发展模式不同,就业和失业状况也不同。大力发展民企对城镇就业至关重要。(3) 中高等教育要改变以考试为主的现状,以提高学生的技术和能力,进而减少技能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4) 失业统计可分类、分人群,以确实反映城镇居民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就业压力。(5) 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 参考文献:

1. 丁仁船、吴瑞君(2006):《农民工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模型及其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 龚刚敏(2005):《我国不同口径失业状况的计算》,《财经问题研究》,第4期。
3. 胡英(2009):《2000~2008年中国城镇、乡村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估计》,《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4. 李实、邓曲恒(2004):《中国城镇失业率的重新估计》,《经济学动态》,第4期。
5. 马忠东、王建平(2010):《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人口研究》,第3期。
6. 钱纳里(Chenery, H.)、塞尔昆(Syrquin, M.)(1988):《发展的型式:1950~1970》,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7. 姚先国、俞玲(2006):《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及其人力资本约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8. 张展新(2006):《城市本地和农村外来劳动力的失业风险——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发现》,《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9.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1982), *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download/res/ecacpop.pdf>.
10. Giles, J., Park, A. and Zhang, J.(2005), What is China's True Unemployment Rat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6(2): 149-170.
11. Han Jun, and Zhang Junsen(2010), Wages, Particip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f Urba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8(3): 513-538.
12. McFadden, D. (1974),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 In Zarembka, P., Editor, *Frontiers in Econometrics*. pp.105-142.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责任编辑:朱 犁)